

《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評介

● 劉宇光



恰白·次旦平措、諾章·吳堅、平措次仁合著，格桑益西、陳慶英、何宗英、許德存合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拉薩：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西藏》雜誌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由西藏社科院副院長、當代西藏古典詩歌派的主要代表恰白·次旦平措主持，並與平措次仁及諾章·吳堅合作撰述，據歷史演講稿改編而成的原藏文版《西藏簡明通史》於1989年10月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1996年1月，漢譯本以《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這個頗具西藏古典修辭風格的標題面世。全書篇幅共998頁，約85萬字，是中國漢語藏學界在90年代中期繼《喇嘛王國的覆滅》^①譯作以後，另一大型西藏史研究。該書出版後更獲得國家最高圖書獎。

如標題所示，本書是一冊西藏通史，從遠古藏族的起源始，歷吐蕃王統及三個政教合一制下的宗教政權一直到本世紀50年代上旬止，前後貫穿近兩千年。其論述以政治發展為主軸，並輔以宗教、文化、學術（醫學、史學）及經濟。全書共七章，以政權為分章依據，其中第七章處理格魯派所成立的甘丹頗章政權，篇幅佔全書幾近一半。總的來說，本書是漢語藏學研究上的劃

時代巨著。為說明本書的特色，本文嘗試把它與下列四類西藏史研究對比：(1) 傳統西藏的各類型史書；(2) 1949年後中國官方，特別是漢族官方學者所撰寫的西藏歷史論著；(3) 80年代中期後出現的各類少數民族史論著，特別是90年代以來由受漢語教育的年青一代藏族學者執筆的西藏文化系列著作或叢書；(4) 兩冊西方近年出版、篇幅與本書相約的藏史論著。

傳統西藏史冊

西藏人是一個非常看重歷史的民族，儘管自八世紀始，他們的文化因佛教的關係而受印度強烈影響，但與印度人大不相同的是，西藏人運用藏曆的饒迥系統對編年史有準確詳細的紀錄，先後寫有成百上千的史傳類著作。而在傳統西藏的文類劃分 (typology of literature) 中，史書可分三類：第一類是「王統紀」(rgyal rabs)，如《西藏王臣記》、《紅史》、《新紅史》、《白史》等；第二類是「教法源流史」(chos byung)，即宗教史及宗教思想史的混合體，如《布頓史》、《青史》、《如意寶樹史》及《宗派源流晶鏡史》等；第三類是「誌傳」，如家族誌(《朗氏家族誌》、《薩迦世系史》、《噶錫世家紀實》)、地方誌(《木里政教史》、《安多政教史》)、個別人物傳記，如「聖徒傳」(rnam thar，如各類達賴及班禪傳、《宗喀巴傳》、《三世章嘉·若白多杰傳》等^②)以及政治人物傳記等。上述第一二類古典史書，更會在記述西藏歷史以外另立專章討論

印度、漢地、蒙古及新疆等區域的文風物土。

本書作者年青時在傳統的西藏學術中心——「學問寺」(gdam sa chen po bzhi) 受教育，不但熟悉大量傳統史冊，而且能選擇性地吸收傳統史書中某些有再創造價值的體例、題材、觀點及行文方式，使本書表現出鮮明的藏族風格。無論是章節分配的架構、具體的書寫內容乃至行文遣詞，傳統的「王統紀」、「教法史」的特點在本書中隨處可見，而在特定小節上亦有「聖徒傳」的色彩。但另一方面，與傳統史冊明顯不同的是，本書擺脫了被宗教濃罩的傳統歷史觀，儘管拉巴平措在本書「代序」中指稱本書「把藏族史引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調未免誇張、不合實情，但它確實繼承了本世紀初藏族異議份子格敦群佩(1903-1951)的歷史著述《白史》的改革精神，亦即「把西藏史研究從神學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帶入人文科學的軌道」。書中對藏族歷史及文化雖然給予極高評價，但都是以人文價值而非宗教信仰的角度為立論基礎。此外，各章都詳略不一地列有專節探討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除帝王一類外，被選列作專節介紹的人物都是以其學術身分而非單純宗教角色為考慮，因而不再生如傳統史冊般花費大量筆墨於不必要的讚詞，這顯然有別於古典史籍。

1949年以後中國出版的漢語西藏史

若與1949年以來用漢語出版的西藏史研究相比，此書亦頗具特殊

西藏人是一個非常看重歷史的民族，他們運用藏曆的饒迥系統對編年史有準確詳細的紀錄，先後寫有成百上千的史傳類著作。在傳統西藏的文類劃分中，史書可分三類：第一類是「王統紀」；第二類是「教法源流史」；第三類是「誌傳」。

意義。先不論它是首部較全面及詳盡的西藏通史，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全是西藏人(包括受過西藏傳統教育的老輩學者)，由他們來論說其傳統文化，較能有相應的理解。此外，書中援用的大量歷史文獻，遠勝前此出版的同類著作，這固然與本書卷帙巨大、容許大幅徵引原始資料有關，但更關鍵的原因則在於作者能直接閱讀汗牛充棟的藏文史籍而不囿於少數的漢譯藏文資料，其中不少詳情都是首次以漢語披露的。

反觀其他同類著作，例如1991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西藏》^③，其編委會中藏人只佔四分之一，而在近120個資料搜集及撰稿人員中，藏族學者不超過5人。另一冊《西藏文明東向發展史》^④則幾乎沒有援引任何藏文文獻，實屬不合情理，故其文獻水平難與本書相提並論。

再者，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類似論著都只著墨於傳統西藏的落後、野蠻、封閉、迷信，因而非要依賴中原的支援(古代)或解放(當代)不可。因此，這些以漢語著述的西藏史，全都是以中原政權的歷史順序來作為劃分西藏政治史分期的標準^⑤。這種劃分原則，顯然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歷史上，西藏與中原之間雖然有着藩屬關係，但在很大程度上，西藏內部事務是相對自主的，其政治發展也有自己的歷史規律，其分段與進程並不必然與中原直接相干。因此，運用中原的歷史時間來為西藏史分期，除了反映出一種君臨天下的心態外，實無助於我們了解西藏史；更何況，大量傳統西藏史冊(如各種「王統紀」)已清楚顯示他們向來就有自己的斷代分類法。也許基於上述理由，作者能突破以往漢語藏史研究的陳

以漢語著述的西藏史，全都是以中原政權的歷史順序來作為劃分西藏政治史分期的標準。這種劃分原則，顯然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歷史上，西藏與中原之間雖然有着藩屬關係，但在很大程度上，西藏內部事務是相對自主的，其政治發展也有自己的歷史規律，其分段與進程並不必然與中原直接相干。



90年代以來，出現了不少由少數民族知識份子（他們大多受漢語教育）撰著的、與少數民族史相關的文化論著。儘管觸及的層面多限於文化主體性及建制內的政治及社會生活平等權，但他們的主體意識仍構成了在官方的少數民族論述外的一個抗衡體系。

規，第一次運用西藏王統及政權作歷史分期：悉補野王統世系諸王，吐蕃贊普王統諸藏王、分裂期，入政教合一制後的薩迦政權、帕木竹巴政權及甘丹頗章政權的十任達賴。可以說，作者是在不碰觸政治主權這一根原則下，含蓄地提出了詮釋西藏政治史時的民族主體性。

如前述，一般漢語西藏史冊都悉力於論證西藏歷史如何向中原「傾斜」，中原因而成為其啟蒙者或解放者，但本書明顯不是這樣理解兩者的關係。它指出，早在七世紀的贊普松贊干布年代，不論是大刀闊斧地建立西藏第一套政法制度，或是從事貿易、吸收外來文化，藏人都是開放地向四鄰八邦學習及交流，絕非只專限於漢地。此外，藏族亦不是被動地接受異族文化，卻是主動地按自己發展的需要來選擇、吸納與再創造其他文化的優點；同時，作者們亦率直地推崇松贊干布為西藏統一開天闢地的成就。這種第一人稱的民族自豪感，很難在漢人學者執筆、只偏重於西藏的弱點與對中原的依賴的藏史論著中找到。

近年少數民族史研究的新視野

當然，這樣一冊巨著之所以能夠面世，實與近年中國國情及學術氛圍有關，以往只有官方聲音的少數民族研究，直至近年才獲得一點自由探討的空間。90年代以來，出現了不少由少數民族知識份子（他們大多受漢語教育）撰著的、與少數民族史相關的文化論著。一直以來，

當局的策略是希望透過這批漢化知識份子掌握少數民族的方向，但沒想到他們竟成了少數民族主體意識的醒覺者。儘管他們觸及的層面多限於文化主體性及建制內的政治及社會生活平等權，而不涉及政治分裂主義或獨立建國運動，但他們的主體意識仍構成了在官方的少數民族論述外的一個抗衡體系。這種趨勢隨着經濟改革而日益深化及擴大。官方試圖藉經改來改善少數民族的物質生活，用以抵銷過去因政策失誤而造成的傷痕與鴻溝。然而，現實的狀況卻是，經濟實力及物質資源的充實，反而使少數族群的文化或民族意識有了具體的着力點，從而更加強化他們的主體意識。例如近年在劉岩的《南傳佛教與傣族文化》、楊庭碩及羅康隆的《西南與中原》、余振貴的《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張承志小說體的《心靈史》等少數民族知識份子的論著中^⑥，都或明或暗地表達了這種立場。雖然這些論著分別探討傣、苗、瑤、回等不同文化，但都不約而同地直接批評了原有的中心／邊緣、先進／落後的格局，並自覺地以第一人稱的身分詮釋自身文化的歷史與意義，從文化詮釋上奪回自身的主體性。因此，不能將《西藏通史》的出現視為偶發的孤立現象，因為在個別性背後其實隱含了藏族及全體少數民族所面對的共同課題，所以它可說是代表了90年代少數民族主體醒覺的一項成果。

若從上述背景來考慮則會發現，與其他受漢語教育的年輕藏族知識份子的藏史論著一樣，《西藏通史》的作者亦在重新認識和肯定那個

一度被徹底否認的、屬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不是盲目地擁抱傳統文化，而是從人文、非信仰的角度來審理包括宗教在內的傳統文化，所以較能批判地意識到傳統世界中的醜陋面。因此，這種「肯定」並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透過再創造的方式為傳統指出新路。《西藏通史》的作者以現代西藏革新派知識份子格敦群佩作為全書最後一節的主題，實亦暗示了這種態度。此外，青海省的年輕藏族學者班班多杰及扎洛的著作，亦是這方面的代表。班班多杰在其《藏傳佛教哲學境界》^⑦一書中，一方面表達了對藏族在現代世界中處境的焦慮與關注，另一方面又同時徵引十三世紀著名西藏哲學家薩迦·班智達及二十世紀德國現象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觀點來解釋唯識哲學的要旨，透過這種再詮釋的實踐活動證明傳統西藏文化在現代世界仍可以是一個活傳統；而未滿三十歲的扎洛在其《藏傳佛教文化圈》^⑧一書內，更為一度被指責得一文不值的傳統西藏文化作反省性的辯解，甚至指出改革後的西藏文化足可與以儒家為傳統的漢地文化平輩論高、互相砥礪。這種朝氣蓬勃的面貌背後，實表達了藏族知識份子重建過往被否定的西藏文化身分的種種努力。

西方近年的大型西藏通史論著

作為一本嚴謹的學術論著，必須能有全球性的視野。事實上，即

使與現有的英語論著相比，《西藏通史》也是毫不遜色的。

由於種種原因，藏學近年在國內外都成為人文科學中的新寵，近十多年來的相關英語著作更是汗牛充棟。90年代以來，史密斯(Warren Smith)及塞繆爾(Geoffrey Samuel)的著作^⑨，無論在篇幅上或是內容上均可與《西藏通史》相比。筆者之所以特別討論史、塞二書，是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目前藏學研究的兩大取向：一是西藏對外(尤其對中國)的政治關係；另一是西藏內部傳統文化及社會的歷史分析。我們暫且不談各書的結論及立場，若僅就資料的豐富性來說，《西藏通史》明顯優勝於前述兩本英語著作；不過，在主題及詮釋上，《西藏通史》似又不及二書來得鮮明及系統，而傾向於作綜論式的平鋪直述，不易呈現出明顯的論證議題，有時甚至因資料過多而失去焦點。對於這一缺點，讀者也不宜深責。因為本書的基本任務——「通史」，使它無法對個別專題作細緻的詮釋性分析；此外，由於藏學在中國大陸的全面起步仍不過是90年代的事，所以在缺乏一冊全面的西藏史的情況下，自然不可能產生深一層的理論詮釋。

結語

在結束本文以前，仍有必要就本書視線不及注意的地方稍作說明。首先，書中論述的主題或人物大多集中在精英階層，明顯忽視了平民社會史及平民文化生活的豐富領域，未免可惜。由於西藏各地《格

90年代以來，史密斯及塞繆爾的著作，代表了目前藏學研究的兩大取向：一是西藏對外(尤其對中國)的政治關係；另一是西藏內部傳統文化及社會的歷史分析。若就資料的豐富性來說，《西藏通史》明顯優勝於這兩本英語著作；不過，在主題及詮釋上，則不及二書鮮明及系統。

《西藏通史》論述的主題或人物大多集中在精英階層，明顯忽視了真正反映牧民的世俗傳統及各地的巫師傳統，此書仍未能為我們全面介紹藏人生活的世界。另外，西藏在遇上西方文明衝擊後，直至本世紀中旬，不同類型的藏族知識份子以不同路線作改革的嘗試等重大問題，本書都很少論述。

薩爾王詩傳》這一牧民的世俗傳統及各地的巫師傳統才真正反映民間世界，但這一民間文化備受傳統西藏社會中的僧侶精英階層漠視，就此而言，此書仍未能為我們全面介紹藏人生活的世界。其次，儘管「甘丹頗章」佔全書近半篇幅，但書中對這一數百年的文化、經濟、知識發展隻字不提；相反地，作者把主題完全集中在政治史上，內容安排與前章不大對稱，未免令人費解。第三，選列以小節立傳的學者多是史學家，卻忽略了不少重要的哲學家，這一缺失的尖銳性在早、中期的格魯派中觀哲學爭論史內最為凸顯，重要人物如格魯派的一世嘉木樣、二世嘉木樣、三世章嘉、三世土觀及薩迦、迦舉、寧瑪各派相關學者都沒有提及，實在遺憾。第四，時下西方對縱貫千多年的西藏文化史已提出分期的理論，以凸顯不同階段的文化特質。有關文化期的劃分本來就與西藏的政權史有內在關連，本書既已率先採用西藏的政治史概念來作為歷史分期的標準，何不更徹底及完整地一併列出文化史的階段劃分。第五，西藏在遇上西方文明衝擊後，因醞釀推動現代化而直接對西藏的政治、社會及文化造成衝擊，直至本世紀中旬，不同類型的藏族知識份子以不同路線作改革的嘗試等重大問題，本書都很少論述。儘管由西方學者撰著的《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可補充這一階段的政治史，但藏人自己的論述實不能缺。最後，耐人尋味的是，如果西藏在1949年以後的變化真的是那麼正面，西藏學者為何對這樣重要而徹底的改變不置一言？

無論如何，本書雖有上述不足，但基本上仍是一部非常傑出的學術著作，值得向那些想認真理解西藏史的讀者推薦。

註釋

- ① 有關此譯作，請見筆者另一篇評論文章：〈《喇嘛王國的覆滅》評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8月號，頁65-69。
- ② 上述所有史傳已有中譯本。
- ③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西藏》（北京：當代中國，1991）。
- ④ 石碩：《西藏文明東向發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⑤ 除了註③、④書以外，讀者亦可參見王貴等著：《西藏歷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多杰才旦主編：《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等書。
- ⑥ 劉岩：《南傳佛教與傣族文化》（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3）；楊庭碩、羅康隆：《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3）；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張承志：《心靈史》（台北：時代出版社，1996）。
- ⑦ 班班多杰：《藏傳佛教哲學境界》（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 ⑧ 扎洛：《藏傳佛教文化圈》（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 ⑨ Warren Smith, *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Geoffrey Samuel: *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